
李先念副总理来我场视察

郭银朝口述 王喜超整理

回忆三十多年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八七村的教导，一直激励着八七村的农民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不断前进。

一九五八年我担任和尚桥乡“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场长（即八七村青年试验场）。四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和青年试验场的王兴、王红孩、王玉枝、马子臣、马焕成等同志正在麦田中拔草，突然试验田东头停下了一辆黑色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直朝我们劳动的地点走来。当他们走到离我们约有五六步时，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吕炳光同志。我们几个同志都停止了干活，向他们围拢过去。

吕炳光书记开口问我们：“谁是队长郭银朝？”

我走到他跟前答：“我是。”

吕炳光书记指着另两位同志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李先念副总理，这位是我们河南省委吴芝圃书记，他们来你们这里看一看，你把情况介绍一下。”

当时，我因心情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李副总理连声称赞说：“这麦子长得好。”并开口问我：“你们这个试验场有多少亩地？多少人管理？象这样的麦苗亩产能打多少斤？”

我回答说：“这是和尚桥乡‘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共有300亩地，43人管理。今年麦苗长势好，估计一亩能打一千斤左右。”

李副总理又问：“你说打一千斤有什么根据？”

我答：“今年麦苗分蘖好，株数比任何一年都多，出头率也相应的高了。估计将来要成75万个穗，少说也会成73万个穗，测算能打一千斤。”

李副总理笑了笑说：“你讲的还有些根据。”接着他又问：“你们是怎样管理的？”

我说：“这地是人工深翻了一尺多，然后分层施肥，春节前又用人粪尿普遍泼了一次，开春后又加施了一次尿素。”他听后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措施好，可以实现一千斤，但还要加强管理才行。毛主席在农业方面提的‘八字宪法’就有管吗。”说着他就随便地蹲在麦田里，象一个熟练的老农，一手拨着麦棵，一手拨着小草，然后站起来说：

“好哇，你们管理的不错，实现一千斤有根据有基础，鼓鼓劲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他又和我们几个一一的握了握手，结束了这次难忘的视察。我们望着公路上飞速奔驰的轿车，回味着李副总理的谆谆教导，心情无比激动，几个人一致表示，下决心搞好麦田管理，争取夏季农业大丰收！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回忆两次见到邓大姐

本 凤口述 张艳翠整理

编者按：我们在编辑核稿过程中，听到有的同志对此稿中“第一次见到邓大姐”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为保证文史资料的真实性，恳请知情者继续来稿。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大姐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痛。30多年前两次见到邓大姐的情景，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1957至1958年间，我先后任古桥乡辛庄大队生产大队长、“三八妇女农场”场长等职。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由于我积极率领广大群众大搞水利建设、工具改革和科学种田，适时播种，合理密植，在农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上级党、政府和群团组织的关怀，荣幸地多次出席县、地、省和全国的劳模会议。

第一次见到邓大姐

1958年10月的一天，县妇联通知我，全国妇联来人了，让我到县上去接。我把工作简单安排了一下，于上午八点多

钟步行赶到县妇联（今老城）。县妇联主任李秀玲对我说：

“全国妇联来人了，要到你那里看看‘三八妇女农场’，看你是不是真劳模。你要以农村普通妇女干部的姿态说话，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并安排电话通知农场，来一辆人力架子车，接全国妇联的来人。

李主任嘱咐后，领我去见全国妇联来人。到了县妇联办公室，李主任介绍说：“她是全国妇联的同志，这位是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场长本凤同志。”全国妇联来人和我热情地握握手，说：“你是本凤同志。”我说：“我是本凤。”又说：“我想到你那里去看看。”我说：“欢迎！”当时，我不知道全国妇联来人的身份，她只身一人，也未带工作人员，李主任没有具体介绍，也不好多问。仔细看全国妇联来人，她身材不高，胖胖的，剪短发，穿着一身朴素的兰衣服，举止大方，说话和气，年龄五十多岁，身体健康。

那时农村条件很差。县城距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30多里路。架子车来到后，车上只铺了一张用高粱叶编的草苫子，让全国妇联来人坐上，我步行。人拉架子车走得快，我在后边紧跟上，一同回到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时，已到中午时分。稍休息了一会儿，就召集古桥村党支部书记吴群，乡团委书记、包场干部魏丙灿等人，先汇报了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的情况。午饭安排的十分简单，那时农村是大食堂，场里伙上炒了两个自己种的蔬菜，主食是食堂的杠子馍。端不出好饭好菜招待客人，我很不好意思，但全国妇联来人却很客气，说吃得很好。

午饭后，全国妇联来人就催着去看农田，由农场副厂长李

根昌、郭奎元，团支部书记石拴妮，妇女主任贾素真和我陪同，看了农场大田和卫星试验田，边看我们边作简单汇报。来人不说话。走到卫星试验田时，她边看边记。因为卫星试验田一亩一方，都挂着牌子，品种、播种时间、单产、负责人，都写得清清楚楚。回到办公室后，她说：“三八妇女农场是妇联会的一面旗帜，你们要好好干下去，获得更大更好的成绩。”她不多停，又让她坐上架子车，我跟着把她送回县妇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当时还不知道她是邓大姐。

过了几天，我到外县参观回来，见到了李秀玲主任。她给我说：“前几天全国妇联来人是邓颖超，是她临走时才告诉我的。”当我知道是邓颖超大姐亲自视察我们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时，我的心情激动地几夜难以入眠。回想与邓大姐一天的相处中，她那只身一人，深入农村，不怕劳累，不怕辛苦的忘我工作精神；她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她那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越想越使我激动和崇敬。

第二次见到邓大姐

1958年底，我荣幸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姓氏笔划编排我坐在第三排第一个座位上。会议开始那天，听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大家心情激动，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一会儿，领导人从前边侧门进来，会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彭德怀元帅走在前边，接着是由两位同志搀扶着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由于我的心里特别想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

席，看着看着，排在第三位的邓颖超大姐已快步走到我的跟前，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本凤同志，你好！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叫邓颖超，前些时去过你那个地方。”我连声说：“认识，认识。邓大姐好！”这时，蔡大姐刚走过我坐的一排，邓大姐又赶紧对蔡大姐介绍说：“这位是河南长葛的本凤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蔡大姐又与我亲切地握手。接见后，会议开始。大会宣布，原定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因为毛主席工作很忙，由彭德怀元帅负责召开这次会议，并向大会作报告。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邓大姐。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的邓大姐，对一位农民，农村的基层干部，在一次未公开身份的接触之后，心里能够记住我，又在那样隆重的场合，用那样难忘的方式，与我热情握手，亲切问候，并主动向蔡大姐介绍，蔡大姐又与我亲切握手，使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许多多。

我两次见到邓大姐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我遵循邓大姐的教导，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坚持在农村干了30多年。领导上几次给我安排工作，我都婉言谢绝了。直到1989年，我已经50多岁了，领导上看我年龄大了，关心我，又将我安排到县城工厂当工人。尊敬的邓大姐，您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您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工人农民的心中，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奔向小康，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1992年9月

谷德同志的学生时代及抗战初期 在长葛一带的革命活动

邢海江 刘金喜座谈整理

谷德，原名谷德荣，1919年4月生于河南省长葛县付桥村一个中农家庭。少年时期即受到革命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治部组织干事，太岳分校队长、政治指导员，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军官一大队政治处副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神泉训练班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教导大队政委，华北军区保卫部科长，志愿军二十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副部长，军委工程兵后勤部副政委，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等职。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时被授予上校，1960年晋升为大校。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冤狱八年，1983年由中央给予彻底平反，1985年离职休养。

革命的启蒙

谷德的父亲谷连山是位私塾老先生，熟读四书，满腹经纶。谷德七岁起跟着父亲读私塾，到学生家轮流吃派饭，有些

学生就叫他“带犊”，常常受到有钱学生的嘲笑和歧视。这深深刺伤了他稚嫩的自尊心，也造就了他不畏强权的坚强性格。

谷德十二岁时，已跟随父亲读完了《上孟子》，对死读书式的旧教育方法深为不满。一次因通背不好挨了严父的戒尺，他向父亲据理力争：“你只叫我死读书不开讲，就是会通背了又有什么用呢？”谷连山老先生想起了自己一生的教训，因为父亲反对他上新学校，学新知识，硬要他去教私塾，结果民国成立后连个小学教员的资格都得不到，只能一辈子教私塾。他决心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当年支持谷德考上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三年级，使谷德摆脱了封建式的旧教育。他告诫谷德要跟上时代，不要落伍。这对谷德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谷德经常与外籍体育教员冯贯山接触。冯当时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谷德从他那里知道了共产党，了解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平分土地，取消剥削，人人有饭吃，有工做。这使谷德对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充满了向往，也是他接受的最早的革命启蒙教育。

上到小学五年级，谷德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立初中。这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谷德积极参加了长葛县的抗日游行示威、查禁日货、组织募捐、下乡宣传等活动，锻炼了革命的活动能力，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

初中二年级，谷德替父亲参加了县小学教员资格考试被

录取。从此，父亲就取得了小学教员的资格，开始教书了。这使谷连山老先生深感儿子的路走对了，对儿子的革命行动从精神到物质上都给予全力的支持。谷德同志在抗日救国革命道路上的每一次转折，都倾注着他老人家的一份心血。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这一年谷德初中毕业，考取了开封东岳艺术师范学校。

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形势下，开封的学校自然也是无法正常学习的。谷德入学不久，就加入了“河南省学生农村救国服务团”，该团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员、平津流亡大学学生吴祖一同志。谷德随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激发人民抗日热情。这时，国民党强迫高中、高师一年级的学生接受战时军事训练。吴祖一同志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学生战时训练总队。他在训练总队组织成立了“良友读书会”，团结爱国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活动。谷德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

在“良友读书会”，同学们经常讨论时事和抗战形势，阅读《思想方法论》、《毛泽东传》、《朱德传》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宣传品，使谷德从革命理论上得到启发和提高，在思想感情上更加靠近共产党，初步奠定了他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础。

战时训练总队第三队队长张省三，是国民党安插在训练总队的国民党别动队武装特务，经常吹嘘自己是国民党地下

别动队特务的身份，对受军训的学生很傲慢，引起学生反感。他把自己的小舅子弄到三中队当特务长，在他的庇护下贪污学生伙食，引起众怒，要求总队严惩。在学生的压力下，训练总队不得不把张省三免职调走。当时谷德就编在三中队，在整个“反张”的行动中，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38年元月，战时军事训练结束，谷德同志也离开了东岳艺术师范，回到了长葛县。

离学回家以后，谷德和初中的同学司振东等一起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寻找抗日救国组织。这时，认识了长葛县民运指导员于永林（第一战区派下来的共产党员秘密党员）、民运协理员陈伯瑾、中学教员陈瑞图（均共产党员）。二陈是兄弟，本县人。县民运办公处就设在陈家，往来人员吃住也由陈家提供。当时陈伯瑾说：“这些我包了，我管后勤。”长葛县的抗日活动，就在共产党员于永林和陈瑞图的带领下逐步发动起来了。

长葛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有两种势力。一是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南紫平为首，主张“片面抗战”，鼓吹抗战时期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蒋介石，反对抗日统一战线。二是以县民运办公处主任于永林（共产党员）为代表，贯彻“全民抗战”的主张，提出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宣传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谷德和同学司振东、董书林、董金瑞、辛金生等，是这一势力的骨干。当时两种势力经常发生一点小摩擦，谷德和他的同学们在县民运办公处（实际是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积极进

行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还要与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南紫平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很尖锐的。比如有一次谷德在壁报上批判了托洛茨基派，南紫平就公开宣称“托派”是国民党的亲密朋友，并大肆污蔑共产党。在这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谷德始终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竹沟受训 加入“民先”

日寇进犯华北以后，中原岌岌可危。于永林、陈瑞图积极进行长期抗战的准备。当他们得知新四军四支队在确山竹沟镇办有教导队训练抗日干部时，决定选派几个人去学习，随时准备沦陷以后打游击。根据谷德的一贯表现，决定派他去竹沟受训，谷德欣然前往。随同谷德一起去学习的还有范喜全、李廷芝、李瑞芝及新郑县高中的两个女学生一共六个人。

1938年2月，经胡清瑞联系介绍，谷德等六人正式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办的教导队学习。教导队下设四个中队，一个女生排，两个女同志编到了女生排，范喜全、李廷芝编到一队，谷德编到二队，并担任了班长。

教导队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有不识字的工人；也有归国的华侨、留学生；有穿高跟鞋的洋学生，也有缠过足的农村妇女。口音山南海北，衣着五花八门，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战目的，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

教导队的生活很艰苦。谷德、范喜全等初到时没有房子住，就在老百姓的牲口槽边打地铺，夜里经常被洒一头草料，睡不了安稳觉。粮食不够吃，经常是面糊糊煮野菜，

有时只有黑豆和豆腐渣，有时上山打草碰上野猪，才能美美地改善一次伙食。条件虽然艰苦，大家的学习热情却很高，膝盖当桌子，石头当凳子，打草砍树自己盖房子。也有个别人吃不了苦而闹情绪，谷德经常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工作磨练。

在教导队，彭雪枫同志经常作政治报告，分析抗战形势，使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八团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亲自讲游击战术课、群众工作课，他虽然不识字，却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因此课讲得很生动，也很风趣。谷德不仅学习刻苦努力，也是教导队的活跃分子。他参加了新四军四师的“拂晓话剧团”，登台演出过《八百壮士》、《烙印》等话剧和活报剧，受到同学的喜爱。

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不久，国民党中一些反共顽固分子总想袭击教导队。因此，教导队经常处于戒备状态。由于武器不够，除了警卫连外，每个中队只有哨兵有枪，其余的人要随身携带铁锹、木棍，以防备国民党袭击。

在竹沟三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谷德不仅学到了游击战术知识和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正式加入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一名自觉的抗日救国战士。1938年5月结束训练，谷德告别教导队，秘密回到长葛，投入到艰苦曲折复杂的抗日救亡斗争之中。

受命出使 团结抗战

谷德回到家乡后，即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到国民抗

敌自卫团三团去作争取团结抗日的工作。

当时党中央的斗争策略，是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用极大的力量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这一精神，长葛县地下党及党领导下的“民先”组织召开了骨干会，分析研究了长葛乃至河南的形势。大家一致认为，继商丘、开封相继失守后，日寇必然要进攻交通要道郑州，长葛也必然要落入敌人手中。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精神，应该想办法团结和争取长葛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内部一部分进步的、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壮大长葛县的抗日阵线。会上进一步分析了长葛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内部的情况：县长兼司令马维轸是个逃跑主义，已经密谋准备将县政府西迁陞山。下辖的三个团按行政区域划分，第一团团长由区长杨少贤兼任，副团长是陈秀峰；第二团团长由区长翟慎修兼任，副团长是胡德福；第三团团长是区长尚延昭兼任，副团长是罗干卿。每个团辖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团约四百多人。若能争取其中一个团一致抗日，就是一支不小的抗日武装力量。大家一致认为，争取三团较为合适。因为三团副团长罗干卿是穷苦出身，不识字，祖上是吹鼓手，他从小给地主当长工，置身绿林后，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在兵慌马乱的年月，他能保护当地的群众不受侵犯，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三团所辖的第一大队有两个中队，大队长赵华山历史上当过土匪，很有胆识，积极抗日，和谷德有表亲关系；两个中队长董青山、董振离均是“民先”队的骨干董

书林、董金瑞的哥哥，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做团结争取工作。会上决定，把这项主要任务交给于永林、谷德、董书林、董金瑞四人去完成。

谷德领受任务后，利用和赵华山的表兄弟关系，以帮助工作的名义住在三官庙，便于和于永林等经常取得联系，也利于做三团一大队的争取工作。谷德、于永林在一大队站住脚后，利用大队长赵华山的关系，很快取得了罗干卿的信任。当时抗战形势紧迫，长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事。但是罗干卿不懂军事，颇为焦急。受过两次军训的谷德在紧要关头给予罗干卿很大帮助，罗对他大为赏识，亲自宣布他为团部军事训练员，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

谷德利用军事训练员的便利条件，和于永林、董金瑞、董书林等经常给抗敌自卫团的官兵讲时事，讲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于永林是东北人，还以现身说法的方法给大家作政治报告，讲述东北沦陷，千百万同胞遭蹂躏的事实，激发官兵的抗日爱国热情。经过于永林、谷德等“民先”队员，对这支部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使该队官兵在军事、政治素质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抗日情绪高涨，初步具备了迎击来犯之敌的能力。尤其是一大队，是团结争取工作的重点。大队长赵华山非常满意，群众基础也比较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民先队”骨干分子李国章、方柏松、司振东等也相继加入了一大队，使一大队的官兵基本上听从“民先队”的指挥。一大队驻地三官庙也发展成了长

葛、新郑、洧川等县的“民先队”联络点。

合作抗日 首战告捷

1938年6月初，日寇进犯尉氏，大有侵犯长葛之势。

6月7日，三官庙临近的尉氏县境内，有日军骑探约四五百人活动，于永林、谷德、大队长赵华山即向上级报告。但此时长葛县国民党党政机关、军队均已逃跑。共产党员于永林和“民先队”骨干谷德与赵华山研究决定，自己组织力量迎击来犯之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和准备：首先派高万顺等二人去侦察敌人的兵力和武装配备；二是召集骨干会议，研究截击敌人的部署方案。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大队长赵华山亲自指挥布署兵力：于永林、谷德、大队长赵华山、中队长董青山，带领六十多名战士组成战斗队，随时准备出击，中队长董振离带少部分战士留守看家。

谷德的父亲得知儿子要去打日本鬼子，非常支持，对他说：“打鬼子是大事，家里再忙不要你管。现在正是你们青年人为国出力的时候，你放心去吧，家里夏收、秋种有我哩。”

6月7日上午，这支抗日队伍由三官庙出发。谷德带着父亲的嘱托，带着乡亲们的重望，走上了抗日杀敌的战场。

队伍途经庞庄、大谷寺、小谷寺北行。行至洧川至新郑公路附近时，侦察员报告说：“有日军约四五百人朝着新郑方向由东往西行进。”于永林、谷德、赵华山见敌众我寡不好下手，就在日军行进的公路左侧附近高粱地里隐蔽地尾随日军

西行，一面监视敌人动向，防止向长葛县进犯，一面伺机打击敌人。行至老庄尚寨西几里处，天色已晚，见日军继续西行，没有进犯长葛之意，就带部队返回老庄尚寨内宿营。

8日凌晨，大队长赵华山正在抽烟，侦察员报告，一股日军由西向东行进，快到老庄尚寨西门了，后又报告日军经过北门到了东门。于永林、谷德催促赵华山赶快出寨。部队紧急由南门出寨，东行到不远处的沙岗上，前哨尖兵就发现了敌人。由于前一日尾随日军一天没有交战，不少战士情绪急躁，未待下令就开枪射击日军。有的站着打，有的脱下衣服光着身子打，仇恨的子弹射向日本侵略者。虽然是第一次交战，但都打得很勇敢。战斗进行了一会儿，日军已摆开了队形，形成三面包围我军的阵势。我军退到另外一个沙丘上，准备利用有利地形继续战斗。前沿只剩下于永林、谷德、赵华山、董青山四个人。于永林右手拿着二八盒子，左手指着赵华山说：“大队长下去吧……”话音未落，左臂就中弹负伤。谷德急忙扶于永林退下包扎，赵华山、董青山继续坚持阻击日军。赵华山表现得很有胆识，连着击倒五六个鬼子，后因董青山的轻机枪没有子弹了才不得不退下来。由于平时的抗日宣传做得好，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也很高，群众手里有不少私枪。战斗打响后，附近老百姓也投入了战斗，当时枪声四起，喊声震天，把日军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不敢尾追我军，便后撤了。我军也顺利地撤回驻地。

战斗结束后，谷德扶于永林退到大墙周寨南门外一个麦场上休息，找了点水喝后回到谷德家。谷德的父亲听说部队

打了胜仗，欣喜若狂，热情地款待了这些抗日勇士。

这一仗，是长葛县国共合作抗日的第一仗，打响了长葛县抗日斗争的第一枪。6月9日，武汉《新华日报》报导：

“昨日军土肥原部一股骑探，向长葛进犯，被我军击退。”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传令嘉奖，长官司令部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王邦屏（地下党员），亲自发给长葛县民运指导员于永林养伤费一百元。

老庄尚一仗的胜利，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胜利。说明党领导下的长葛县“民先队”已经逐步成熟起来，威望空前提高。于永林、谷德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三团副团长罗干卿对于永林、谷德更加器重，专门给谷德安排了办公室、宿舍，要求他们再找一些抗日青年充实到他的各个大队里去当骨干。从此，于永林、谷德在三团的脚跟站得较稳了。

逃脱通缉 奔赴延安

随着日寇的铁蹄逐步向南进犯，“民先队”迫切感到与日本鬼子打游击已势在必行。因此，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决定以民运办事处的名义成立一个长葛、新郑、密县、洧川、登封“五县民运联合办事处”，以便在沦陷后建立一个小根据地，并在办事处领导下设立一个“青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事先让于永林、谷德前往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摸一下情况。他们了解到长官司令部增加了一些反共顽固分子，阴谋把各县的民运办公处撤销。因为，各县民运办公处指导员大多是共产党员，于永林就是其中一例。根据这